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道德情操与 物质利益

经济生活中合作的基础



*Moral Sentiments and  
Material Interests  
the Foundations of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Life*

赫尔伯特·金蒂斯 (Herbert Gintis)  
塞缪尔·鲍尔斯 (Samuel Bowles) / 主编  
罗伯特·博伊德 (Robert Boyd)  
恩斯特·费尔 (Ernst Fehr)  
李风华 彭正德 孙毅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道德情操与 物质利益

## 经济生活中合作的基础

赫尔伯特·金蒂斯 (Herbert Gintis)

塞缪尔·鲍尔斯 (Samuel Bowles)

罗伯特·博伊德 (Robert Boyd) / 主编

恩斯特·费尔 (Ernst Fehr)

李风华 彭正德 孙毅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德情操与物质利益: 经济生活中合作的基础 / (美) 金蒂斯等主编; 李风华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书名原文: Moral sentiments and material interests; the foundations of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life

ISBN 978-7-300-20719-3

I. ①道… II. ①金…②李… III. ①经济-关系-社会生活-研究 IV. ①C91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1941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道德情操与物质利益: 经济生活中合作的基础

赫尔伯特·金蒂斯 塞缪尔·鲍尔斯 罗伯特·博伊德 恩斯特·费尔 / 主编  
李风华 彭正德 孙毅 / 译

Daode Qingcao yu Wuzhi Liyi; Jingji Shenghuo zhong Hezuo de Jichu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96 000	定 价 7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献给阿黛尔·西蒙斯，作为约翰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的主席，她富有远见与勇气来支持行为科学中的非传统的跨学科研究。

#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选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前 言



行为科学历来存在两种有关合作的对立解释。一种解释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倾向的，将个人私利服从于群体需要的意愿视为人类本质的组成部分。另一种解释则为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所青睐，将合作看做自私的行动者为最大化其长期个人物质利益而彼此互动的产物。《道德情操与物质利益：经济生活中合作的基础》则认为绝大多数人都不属于这两种类型。相反，他们是有条件的合作者（conditional co-operators）和利他主义惩罚者（altruistic punishers）。我们将这类人称为强互惠者（strong reciprocators），并证明了当社会群体内部存在足够比例的强互惠者时，就能达成一定水平的合作，然后我们讨论了这种现象在政治哲学和



社会政策上的含义。

本书所提出的研究酝酿于1997年，最初的想法是受到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及其苏黎世大学的同事的早期经验研究以及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和彼得·里彻逊（Peter Richerson）所开创的文化演进的分析模型的启示。1998年10月，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行为科学家们聚在马萨诸塞大学，探讨了各种基本假设。我们从一些作者那里邀约了稿件，并于2001年3月在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重聚，以审查和交流我们的研究结果。经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修改和更新，再加上一些新约的稿件，就构成了以下诸章的内容。

该研究的特色不仅在于其结论，而且也在于其方法。第一，我们根据实验室控制下的实验数据和田野调查得来的数据来做出有关人类动机的判断。第二，我们忽略了那些有碍发展出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分析模型的学科畛域，从而得以融合经济学、人类学、演进生物学、人类生物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见解。我们共享相同的博弈论术语和具有一致性的行为方法论，从而得以在分析的层面上将这些学科结合起来。

对那些参与了我们的研讨会而其文章没有被收入本文集的学者，我们表示感谢。他们包括莱达·科斯米迪（Leda Cosmides）、乔舒亚·爱泼斯坦（Joshua Epstein）、史蒂夫·弗兰克（Steve Frank）、乔尔·古特曼（Joel Guttman）、凯文·麦凯布（Kevin McCabe）、阿瑟·罗布森（Arthur Robson）、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和约翰·托比（John Tooby）。我们受益于约翰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与精神鼓励，这让我们得以构建这个关于规范和偏好的本质与起源研究的网络组织，在五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跨国的实验、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工作。我们还特别感谢肯·宾默尔（Ken Binmore），他参加了我们的第一次会议，并鼓励我们将本书纳入他主持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经济学习与社会演进”。我们还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高级编审伊丽莎白·莫瑞（Elizabeth Murry），她使本书得以完善并出版。我们还向麦克阿瑟基金会主席阿黛尔·西蒙斯（Adele Simmons）表示特别的感谢，她极力支持对人类行为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想法，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将这一想法付诸现实。

# 目 录

第一篇	引 言 .....	1
	1 道德情操与物质利益： 起源、证据与结果 .....	3
第二篇	合作的行为生态学 .....	41
	2 灵长类动物群体中合作的演化 .....	43
	3 人类食物分享和合作的自然史：研究 综述和新的规范协商的多个体路径 .....	77
	4 高成本信号传递与合作行为 .....	115
第三篇	强互惠的建模与检验 .....	147
	5 强互惠的经济学 .....	149
	6 构建强互惠模型 .....	188
	7 利他主义惩罚的演进 .....	208
	8 规范服从与强互惠 .....	221





<b>第四篇</b>	<b>互惠与社会政策</b> .....	241
	9 挤出互惠与集体行动的政策 .....	243
	10 互惠与福利国家 .....	266
	11 公平、互惠和工资刚性 .....	291
	12 互惠的逻辑：信任、集体行动和法 .....	327
	13 社会资本、道德情操与社区治理 .....	365
	<b>译名对照表</b> .....	384

# 第一篇

---

引

言



# 1 道德情操与物质利益： 起源、证据与结果

赫尔伯特·金蒂斯 (Herbert Gintis)

塞缪尔·鲍尔斯 (Samuel Bowles)

罗伯特·博伊德 (Robert Boyd)

恩斯特·费尔 (Ernst Fehr)

## 1.1 引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宣称市场竞争是繁荣的关键因素。他指出，市场竞争有许多美德，其中一个就是能够创造奇迹，哪怕买者和卖者都是完全自私的。事实上，当他们自私的时候，市场有时会效果更好。“我们不能期望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慈善心得到我们的晚餐，”斯密写道，“而是从他们关怀他们自己的利益去得到。”由此，斯密往往被描述成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一种充斥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自私的、追求物质利益的生物——



的支持者。这一看法忽略了斯密的第二部——并且是同样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该书对人类性格给出了更为复杂的描述。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sup>①</sup> 该书对人类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审查，致力于证明“同情”（sympathy）是我们对待他人的核心动机。

本书所提出的思想是亚当·斯密和其朋友兼导师大卫·休谟的知识传统的延续，这一知识传统还包括托马斯·马尔萨斯、查尔斯·达尔文和埃米尔·涂尔干，以及最近的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和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但是，斯密的遗产也引向另外一个方向，通过大卫·李嘉图、弗朗西斯·埃奇沃斯和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一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后一传统仅仅认可自利行为。

在20世纪中，市场经济体中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只留意于斯密的第二传统，认为社会政策的目标是提高社会福利，手段则是给予物质刺激来诱使那些仅仅关注自身利益的行动者对公共产品作出贡献。这一模式没有给伦理学留出任何位置。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1985, 10）强调了这一方法在处理犯罪和腐败问题上的弱势：

在反伦理行为或反社会行为问题上，经济学家往往求助于行为的成本，而不是诉诸规范和惩罚…… [然而，] 将法和条例公之于众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反社会行为成为耻辱，并以此影响公民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赫希曼反对的是政治哲学中一个可敬的传统。还在斯密《国富论》出版前五年的1754年，大卫·休谟建议道：“创建任何政府形式的时候……每个人都应当被视做无赖，并且他的所有行动都被看做除了追求其私人利益之外再无其他目的”（Hume, 1898 [1754]）。然而，如果某个人恰巧拥有如斯密所描述的那种高尚情操，谨慎的人们则推荐了另外一句格言：“有效的政策是那些支持被社会重视的目标的政策，它们不仅根据社会重视的目

<sup>①</sup>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标来限制自私动机，而且还激发、培养和鼓励富有公共精神的动机（public-spirited motives）。”本书的研究支持后面这一看法。

在本书所描述的研究进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经验。首先，交叉学科研究现在能够实现许多传统学科内部研究所不能实现的目标。20世纪是一个学科专业化的时代，而21世纪也许将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的时代。它的信条将是：当不同的学科集中关注某个知识主题时，在它们重叠的地方，模型将相互支持并且取得一致性。其次，将经济理论（尤其是博弈论）与社会心理学、经济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实验技术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对人类行为的复杂模型做出经验上的检验。在这种学科方法统一后所获得的数据将有助于我们推导出明确的人类行为原则，而依靠传统的经验数据我们无法明确无误地做到这一点。

这一实验方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让其他参数成为常量的同时，它允许对那些我们认为影响行为的参数构造出精巧的实验变量。有了这些技术，实验经济学家就可以估计利他行为（altruist behaviors）的价格与成本效应，并且在经验上证明我们的直觉。该直觉认为，如果给予者（giver）慷慨施予的成本越高，接受者（recipient）获得的利益越少，那么这类实验对象将较少地出现慷慨行为（Andreoni and Miller, 2002）。<sup>[1]</sup>实验可以得出这种“慷慨的供给函数”（supply function of generosity）和其他参数，这些结果将有助于确证这一观点，即涉他行为（other-regarding behaviors）与理性的根本观念并不相悖。在那些经常使用涉他行为方法的领域中，它们还有助于搭建通往应用经济学和生物学的模型分析的跨学科桥梁，让这些领域从其他不经常使用涉他行为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经验知识中获益。

由于我们在本书中广泛使用了实验室实验，所以有必要预先就实验方法的不足做一些说明。最明显的短处就是实验对象在实验室环境中与在“真实世界”环境中的行为完全两样（Loewenstein, 1999）。物理学、化学和农艺学的精密实验设计的一个好处是，所研究的实体——原子、试剂和土壤等——不管在实验室环境里还是在实验室之外，其行为大体一致（默里·格尔曼 [Murray Gell-Mann] 曾经挖苦到，如果粒子也能够思考的话，那么物理学将难以自处）。一旦对象能够思考，那么“实验者效应”（experimenter effect）就很常见。不管实验环境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室外，这都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情境，因此有可能会影响对象的行为反应。有证据显示，实验行为与非实验环境中的行为存在着匹配（Henrich et al., 2001），而在信



任之类的行为问题上，实验行为要比那些被广泛使用的观察工具所得出的结论更具有预测力（Glaeser et al.，2000）。但在实验的行为效度问题上，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消除我们对实验者效应的疑虑。因此，不管实验方法如何重要，它仍然不可以代替统计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方法。相反，实验方法可以对这些方法提出补充。比如，Henrich 等（2003）的著作就综合使用了实验方法、人类学描述和跨文化的统计假设检验方法。

本书是一种建立在可控人类行为实验研究基础之上的广泛的跨学科研究运动的一部分，这种研究既发生在实验室中，也发生在实验室外——工厂、学校、养老院、城市和农村社区、发达和简单的社会。在各种文化的特质的概念化和理解跨文化的社会可变性方面，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将实验室博弈作为一种有力的数据处理工具（Henrich et al.，2003）。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家利用博弈论工具来建构和检验有关社会互动的假设，从而提高了其实验数据的质量和可解释性（Hertwig and Ortmann，2001）。政治学家发现这类技术在投票行为的建模方面很有帮助（Frohlich and Oppenheimer，1990；Monroe，1991）。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对他们所研究的社会互动行为进行分析性的建模有助于其他行为科学领域的学者接受他们的理论（Coleman，1990；Hechter and Kanazawa，1997）。

但从本书所提供的研究方法中获益最多的是经济学和人类生物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理论传统上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可以从那些可以进行因果检验的明确原则中推导出来。其中一个假设就是个人是涉己的（self-regarding）。<sup>[2]</sup>这一涉己偏好的标准模型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它们都与我们日常观察到的以及本章将提到的在实验室和室外观察到的现象完全不一致。该模型的第一个含义是行动者仅仅关注经济互动的结果，对达致该结果的过程（比如讨价还价、强迫、机会和自愿奉献）则毫不在意。该模型的第二个含义是行动者仅仅关注互动中他们个人的得失，而对其他人的得失（或其他人意向的实质）毫不在意。由于这些假设的地位丝毫未动，所以经济理论直到最近仍然更多类似于数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一个接一个地证明有关人类行为的定理，但这些定理却极少能够通过经验有效性的检验。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早就明白，只有预测的准确性——而不是其公理的似可信性（plausibility）——才能证明新古典经济人模型（Friedman，1953）。弗里德曼的一般立场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所有可以处理的模型都是对现实的简化。但我们现在知道，建立在涉己行动者的模型之上的

预测很难在经验审查中立住脚，这也使得这种模型在许多环境中无所作为。

人类生物学中也有类似的情景。生物学因两种理论——总括适应度 (inclusive fitness) 和互惠利他主义 (reciprocal altruism) ——的简洁而明显的解释力而自负 (Hamilton, 1964; Williams, 1966; Trivers, 1971)。汉密尔顿证明，我们并不需要用种类层面上的利他主义这种异常观念来解释个体之间的合作。如果在生物相关性  $r$  程度上 (比如在父母—孩子或兄弟关系中假定  $r=0.5$ ，而在祖父母—孙辈之间则假定  $r=0.25$ )，某种行为使得某一个体付出成本  $c$  来让另外一个个体受益  $b$ ，那么，只有在  $r > c/b$  的时候，该行为才有可能扩散。汉密尔顿的总括适应度对于现代有关动物行为的解释来说非常关键，也非常成功 (Alcock, 1993)。特里弗斯在汉密尔顿之后证明，一个自私的个体也可能会帮助与其无关的其他个体，只要存在一种充分的可能性，即这一帮助将来会得到回报。他明智地强调了几类加强适应度效应的貌似“非理性的”情感和行为，诸如罪恶感、感激、道德主义侵略 (moralist aggression) 和弥补性利他主义 (reparative altruism)。特里弗斯的互惠利他主义反映出对自利的主体在缺乏低成本的第三方执行的情况下进行交换的经济分析 (Axelrod and Hamilton, 1981)，虽然它在非人类物种上仅仅存在非常有限的应用，但已经成为人类行为的生物模型的基石 (Dawkins, 1976; Wilson, 1975)。

这些理论让一整代研究者相信，除了为家庭而做出牺牲之外，那些表现为利他主义 (个人为他人的利益而做出牺牲) 的行为事实上只是为了长期的物质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人类生物学与经济学的起点不同、逻辑不同，但其却与经济学处于一样的情境。比如，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在经济学家中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他在《自私的基因》(1989 [1976], v.) 中信心满怀地宣称，“我们是幸存下来的机器人，一无所知地被设定程序，其目的是保存被称为基因的分子……这些基因的自私性通常会会导致个人行为的自私性”。R. D. 亚历山大 (R. D. Alexander) 的《道德体系的生物学》就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氛围，该书声称，“只有将社会视为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人的集合，伦理学、道德、人类行为和人类心理才能够得到理解……” (1987, 3)

然而经验证据支持非涉己动机的普遍存在，这让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涉己人类行动者模型蒙上了怀疑的阴影。许多这类实验检验了被我们称为强互惠 (strong reciprocity) 的行为现象。强互惠是一种与其他人合作的





倾向，并且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如果必要的话，牺牲个人利益），但即使这样做，行动者也无法合理地预期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是否能够补偿这些成本。<sup>[3]</sup>生物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中标准的利他主义行为模型（Trivers, 1971; Taylor, 1976; Axelrod and Hamilton, 1981; Fudenberg and Maskin, 1986）依赖于重复互动，从而建立起个人的信誉和对违背规范者的惩罚。而强互惠则恰恰相反，即使在非重复的匿名环境下它也能够起作用。<sup>[4]</sup>

强互惠不仅有助于建构人类行为的分析模型，而且也有助于建构更令人信服的 21 世纪政治哲学这一更为宏大的任务。以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在人类行为方面的论述中往往透彻微妙，它们被简单地理解成或者假定人类行为本质上是涉己的（比如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或者打着正当社会秩序的名义假定人类行为本质上是利他主义的（比如让·雅克·卢梭和卡尔·马克思）。事实上，人们往往既不是完全涉己的，也不完全是利他主义的。强互惠者是一些有条件的合作者（conditional cooperators，他们行事之所以利他仅仅因为别人也这样做）和利他主义的惩罚者（altruistic punishers，他们对那些根据现行的合作规范来说行事不当的人实施制裁）。

演化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突变基因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做出牺牲——此时那些得到帮助的人与给予者并不存在亲缘关系，因此不包含该突变基因并且自然选择仅仅在基因或个体层面上进行而不是在更高序列的群体上进行，那么，该突变基因必然会消失。在一个由乐意为他人牺牲的个体组成的人群中，如果某个突变体拒绝牺牲，那么该突变体将以其其他利他主义同伴为代价而扩展到一个固定比例。任何其他涉及自然选择的模型都必然要高于个体这个层次。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使用这些模型是非常自然的，但拒绝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的经典批判的生物学家却尽可能避免这样做，这些生物学家有 Williams (1966)、道金斯 (1976)、迈纳德·史密斯 (1976)、Crow 和 Kimura (1970) 等人，汉密尔顿 (1964) 和特里弗斯 (1971) 则提供了更为合理的替代模型。

然而强互惠的证据则对这些（个体选择）模型的普遍存在提出了质疑。此外，对群体选择的批判一旦应用于人类而不是其他动物时，就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这些批判尤其在下面这些情况中极大地弱化了其力量：当（1）利他主义惩罚显著存在并且惩罚的成本相对较低时，比如智人（*homo sapiens*）；（2）存在着纯粹的文化选择（cultural selection）或基因一文